

# 唐文治先生学术中的汉、宋之辨

彭 林

〔摘要〕 中国传统学术有汉学、宋学之争,前者重考据,后者重义理,彼此各为营垒,水火不容。梁启超赞扬乾嘉学派,扬汉抑宋,影响极大。如何看待二者优劣?在近现代中国,宋学是否还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唐文治先生以“茹经”为堂号,乃近代经学的典范。本文通过考察先生一生治学、办学、论学的经历,希冀揭示其汉宋兼治的学术底蕴,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的经学引领,以及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高扬宋学,希冀挽救世道人心,旋转乾坤的学者胸襟。

〔关键词〕 汉学;宋学;乾嘉学派;唐文治;无锡国专

〔中图分类号〕 B2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7)05—0041—06

〔作者简介〕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100084

清儒好以汉、宋剖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汉学重训诂,宋学主义理,各有营垒,非此即彼。乾嘉学人以承继“汉学”为标榜,以小学解经为擅场,于宋学则颇存敌忾之气,诟病殊多。唐文治先生身处清末民初,以“茹经”为堂号,又曾主持刊刻《十三经注疏》,嗜好经学之程度,可见一斑。然则,唐先生之学术宋耶、汉耶?此因涉及先生治学旨趣,不能不引起笔者之兴趣。

## 一 南菁书院:汉、宋兼修

唐文治先生早年问学,汉宋兼攻。唐先生自述早年求学经历云:“文治于弱冠后好研经,壬辰服官后,始治朱子学。”<sup>①</sup>14岁读《五经》毕,16岁中秀才。17岁受业于本乡紫翔王祖蕃先生。18岁中举。21岁(1885)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元同黄以周先生,历时三年之久,此际经历,影响先生终身:

余自十七岁已受业于紫翔夫子之门,即从事于周、程、张、朱诸家集,及《小学》《近思录》各书,沉潜反复,颇有心得。至乙酉岁肄业南菁,受业于定海黄元同先生之门,始从事汉学,粗识各经家法,而于义理之学,则稍稍隔膜矣。<sup>②</sup>

南菁书院,乃清季江苏学政黄体芳得两江总督左宗棠鼎助,于光绪十年(1884)所建,院名乃约取朱子《子游祠堂记》“南方之学,得其菁华”句意而成。南菁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书院并未追随当时学界的佞汉之风,而是汉、宋兼尊。由唐文治先生日记可知,书院藏书楼内设有汉、宋之学两位大师郑玄、朱子的牌位,每月初一致祭。<sup>③</sup>学业考核,以汉、宋分门,各自排列名次。

先生求学,王紫翔与黄元同二先生施教尤多。紫翔先生为人最重气节,刊落声华,学术得力于清初理学家陆陇其者最多;主张汉宋调和,认为“自文章与学问分而学术歧,经学与理学分而学术尤裂……故必文章与学问合,经学与理学合,则周公之制作,孔子之删订,又何偏重之弊乎!”其为学之

① 《朱文公文集校释序》,《茹经堂文集》二编卷5,《民国丛书》第5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南菁书院日记十六则·附录》,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以下引此书者,只标页码。

③ 《南菁书院日记十六则》乙酉年二月初一日,《唐文治文选》,第1页。

志 则“在于扶纲常 正人心 明礼义 贱功利 善善恶恶 崇正黜邪” 根底《六经》 精研程朱 校书三千余卷 著有《读左质疑》《文贞文集》《四书章句集注校语》《读孟随笔》《礼记经注校证》《孟子读本》《史记校正》《汉书校正》等。

紫翔先生尝慨然谓文治云 其撰《读左质疑》,“删裁繁诬 匡正悠谬”,“务使后世学者 有以见圣经显微阐幽之意 与夫黜邪崇正 内诸夏 外夷狄之大原。庶几缀学之士 稍稍知经世之务 不至于违离道本”。<sup>①</sup> 王紫翔《左传考释》撰成 唐先生作“书后” 申述是书学综汉宋 务求昌明经旨:

夫乾嘉以来 言汉学者多矣 一时掣经诸老 钩稽故训 辨析名物 哀辑经解诸编 穷乡僻壤 几于无所不搜。而独于吾萎阙如者 盖吾郡自国初以来 维时适桴亭 蔚村诸君子 相与主张义理之学 学者皆精研性道 砥砺躬行 抗心濂洛关闽之绪 而于训诂 名物 考据之学 则往往辍而不讲。独太原王氏 实以经学世其家 于《春秋》一经 代有作述 而其书又浮沉汗漫 或简编散佚 罕传于世。先生之发愤从事于《春秋》者 非特其平日心得之蕴之不可终秘 盖亦其家法本然也。而是书之广博贯串 无所不赅 则尤为近代治是经者未有之作。<sup>②</sup>

唐先生总结《左传考释》六条大纲: 一曰明小学 二曰精地理 三曰正杜失 四曰申古义 五曰详氏族 六曰正经史 皆为为正宗汉学路数。可知紫翔先生虽倾心程朱理学 然绝不弃汉学。

黄以周乃著名经学大师 博贯群经 尤精《三礼》 著作有《群经说》4卷、《经说略》2卷、《经训比义》3卷、《礼说》6卷、《礼说略》3卷、《五礼异议》、《尚书讲义》等二十余种,<sup>③</sup>亦汉宋兼擅代表作为《礼书通故》102卷。

唐先生白云在南菁书院期间,“乙酉年用功最为笃实”<sup>④</sup> 学业优异。据先生南菁书院乙酉年日记载,“七月 汉学列超等六名 宋学列超等一名。八月 汉学列超等三名”。<sup>⑤</sup> 是为先生不废汉宋 兼采并重之明证。据先生乙酉年寥寥数十日日记所见 手眼所过之经籍文献即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王应麟《困学纪闻》,王筠《说文句读》,陈淳《北溪字义》,段玉裁《六书音韵表》、《说文解字注》,刘融斋《说文双声叠韵》,李光地《音韵阐微》,李汝珍《音鉴启蒙》,张惠言《虞氏消息》,焦循《易通释》,李鼎祚《周易集解》,毛奇龄《仲氏易》,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李黼平《毛诗细义》,庄存与《春秋正辞》,赵坦《春秋异文笺》,惠栋《九经古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李惇《群经识小》,卢文弨《龙城札记》,王鸣盛《蛾术编》,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黄以周《经义通论》等 多为清人经学著述。在读期间 先生还曾协助王先谦校刊《清经解》。

先生不仅广泛涉猎经学文献 而且钻研音韵 训诂之学 南菁日记载见先生学习上古音之种种努力 限于篇幅 此不赘述。先生所撰之《鲁诗有传无传考》<sup>⑥</sup>、《汉书艺文志尔雅属孝经类说》<sup>⑦</sup>、《郑君述汉律考》<sup>⑧</sup>、《书左传考释后》<sup>⑨</sup>等均是考据学之力作。

## 二 对考据家之失望

自清初毛奇龄推尊汉儒经说 抨击宋人旧说 汉帜由此而立。乾嘉考据之学兴 诸老于汉学之外自辟町畦 成就可观 学界一时为之风靡 此无可否定。问题在于 诸老因此刻意诋毁 而肆意排斥宋学 处处扬汉抑宋 非议程朱 宋学几于溃不成军。此绝非学术真精神 唐先生批评云:

① 《书左传考释后》,《茹经堂文集》二编卷5。

② 《书左传考释后》,《茹经堂文集》二编卷5。

③ 韩岚、张涅《晚清黄式三、黄以周著述现存版本知见录》,《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3年第2期。

④ 《南菁书院日记十六则·附录》,《唐文治文选》,第7页。

⑤ 《南菁书院日记十六则》乙酉年二月初二日,《唐文治文选》,第2页。

⑥ 《茹经堂文集》二编卷1。

⑦ 《茹经堂文集》二编卷2。

⑧ 《茹经堂文集》二编卷2。

⑨ 《茹经堂文集》二编卷5。

近世有训诂之学,有义理之学,其外又有顿悟之学。言训诂者病义理为空疏,言义理者病训诂为泛鹜,而言顿悟者,更病义理为支离。甚有主训诂之学,目未见程朱书,而亦痛斥宋儒者。主义理之学,目未见许郑之书,而亦痛斥汉儒者。痛斥宋儒而躬行视为迂腐;痛斥汉儒而经书束之高阁;言顿悟者,并且绝圣弃智,专认本来面目矣。此岂复成儒者气象哉!……窃愿于训诂、义理二者,皆稍稍涉其流。俾言训诂者不至斥义理为空疏,言义理者不至斥训诂为泛鹜,而顿悟之学,尤思辨其似是之非,至于其他,非所敢志。<sup>①</sup>

风气之所至,进而以理学为洪水猛兽,谩骂、抹黑有加,学者则避之唯恐不及,王紫翔先生感慨“近日讲学极难,有避道学之名者,则讳而不讲,即有讲者,先入主出奴之见存于胸中”;学术之理性精神,早已置之脑后。至民国初年,此风犹炽。对此,唐先生多有批评:

盖向之所云钩稽故训、辨析名物之学,降至今世,其弊则已不可究极。或析言而破律,或碎义而逃难,往往刺取古经一字一义,解说至累千万言,聚讼而不能决。又其甚者,分门别户,当著书之始,先存一凌驾古人之心,于是穿凿附会,泛剽旧典,务使其说之新奇,足以骇学者之耳目而后止。而于是古圣人之微言大义,所以劝善惩恶,苏世觉民之旨,则迷谬不省,甚或斥为空言,而以为非汉学家之宗旨。<sup>②</sup>

乾嘉学人夸大考据学对于经学的意义,声言故训不明,则经旨不明,指责宋儒之论,游谈无根,不过是以意说经:

乾嘉诸老多诋宋儒以意说经,不知宋儒非以意说经,所以不墨守故训者,乃因圣经之言而反之于身也。……孔子释经,并不墨守故训,所言必事之反之于身。若程朱之说经,真得圣门家法者也。<sup>③</sup>

乾嘉诸老之说,武断大于客观,此以《孟子》研究为例。群经之中,唐先生最喜《孟子》,于此经潜心研索,最有心得,堪称最知孟子者。清儒戴震的孟子研究,素受学者推尊;焦循承戴震绪余,作《孟子正义》,学界目为经学典范,阮元则誉之为“斯一大家”。王紫翔先生云“戴东原先生《孟子字义疏证》立说俱是,而近于毁骂。至焦理堂作《孟子正义》,更失东原先生之旧。”<sup>④</sup>唐先生赞同紫翔先生对焦著的见解,且“不能无讥者”。

首先,汉儒赵岐乃最早为《孟子》作注者,其《孟子章句》尚属草创,虽不尽完善,但此书以仁义、心性、王霸为核心,则不失本原;宋儒又将其发挥到极致,无人可以比肩:

夫《孟子》一书,大要在崇仁义,辨心性,别王霸。而仁义、心性、王霸之辨,则莫精于宋儒。自朱子《集注》行,后之潜研理学者,萃诸儒之说编为大全,精谭性道,辨析毫芒,此诚赵氏所不逮。

焦氏对宋儒之上述成似乎一无所知,每每引戴震之说为说,若论及宋儒,则与释、老并提并讥,不惜曲解《孟子》原意:

观《正义》于每章之言心、言仁义者,辄引《字义疏证》为说。夫东原固好诋宋儒者也。驰骋辩驳,已不免有喧嚣之习。理堂悉采其说,而间参己意。论性善则杂饮食男女以为言,论理气则合程朱与老释并讥,论尽心知性,则援血气嗜欲以为自然之极致。牵引杂糅,岂有得于孟子意耶?

焦氏之孟子学,屏绝程朱之说,不仅无法及于宋儒的精微之处,而且徒逞异说,甚至欲将孟子列于荀子一流,已是违道离本:

蒙尝谓治他经之学,或可专守汉注,而《论语》及《孟子》两书,辨别仁义、心性、王霸,必屏宋儒而不用,其感者必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道离本。班氏《艺文志·儒家论》,实今世

① 《南菁书院日记十六则》,《唐文治文选》,第6页。

② 《书左传考释后》,《茹经堂文集》二编卷5。

③ 《续思辨录题词》,《唐文治文选》,第193页。

④ 《南菁书院日记十六则》,《唐文治文选》,第5页。

之药石也。夫汉学崇尚家法,墨守一先生之言,不敢有所出入。焦氏《孟子正义》主张戴东原学,而扬波逐靡,必欲侪孟子于荀卿之流,蒙不知其所为家法者安在?<sup>①</sup>考据学派如此故步自封,加之时局危殆,诸老依然坐拥书城,罔顾国势民心之变,故唐先生对之批评甚严,以致回忆入仕之前的考据学研究,不无惭愧之意。“余沉溺于训诂者数年,自谓守好古之训,其实只泥古耳。”<sup>②</sup>

### 三 欲以道学挽救世风、学风

平心而论,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均为学术之一部分,若能相辅相成,必能有大气象。此外,无论专做训诂,抑或专做义理,皆能有所成就。唐先生壮年以后之学术,转而以理学为主,乃是与自身所处之时代密切相关。

儒家的学术传统,历来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然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割地赔款,瓜分中华,国将不国,学者再无平静的书桌可言。考据之学已无力因应如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凡有良知、有担当的学者,必然忧天下之所忧,以拯救国家为己任。此外,中华民族自古以道德维系人心,此时因西学之冲击,道德理想在社会层面已荡然无存。目睹官场之腐败成风,民众如散沙一盘。唐先生以为若要救国,必先收拾人心,重建传统的道德,此一重任,唯有宋明理学可以担当:

比年官京师,目击世道人心,慨然有感,欲以程朱坠绪,振厉后学。<sup>③</sup>

窃惟方今世道浇张,人心陷溺,士大夫好利夸诞,无所顾忌,礼义廉耻、气节之说,扫地无余。而驱商市俗者流,乃得乘其敝而起,相与矜情饰貌,大言欺人,以凯遂其无穷之欲。一旦得志,乃惟声色货利之是徇,藉以自肥其身价,私饱其囊橐。举世滔滔,而天下之风气,益至于变幻离奇,天下之人才,益至于耗散蠹坏,国家大事,益至于溃败糜烂不可收拾。<sup>④</sup>中国不乏试图破局之人,但在当时思潮之下,知识精英多寄希望于变法,以西学救中国,唐先生不以为然:

故文治尝谓昔日之患,患在学术;今日之患,患在人心。人心之祸,苟非得圣贤之士,有以正其本原,窃恐天下之势,如江河之日下,庠序之林,皆将为庸恶猥琐、谄淫邪遁之徒熏蒸而失其本性。而论者且谓变法可以洗心,不知今日之法,万不足以变今日之人心。……故十馀年来,何尝不言变法,而法卒愈变而愈坏者,此其故盖可知也。<sup>⑤</sup>

唐先生认为欲挽狂澜于既倒,拯救危局,唯有通过教育,先生先后主持南洋大学、无锡国学专修馆,正是欲以教育救亡图存:

夫世界一教育场地,国家一大学校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可以定一时,善教可以淑数世。<sup>⑥</sup>

教育的内容,必须以中学为体,借以确立中华本位文化的主体地位;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旨在制夷,争取民族独立。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载体与理论形态,是中国道德仁义学说的渊藪。当时思想界的混乱,在于废除尊孔读经,故唐先生提出救国必自读经始之说:

人心之害孰为之?废经为之也!废经而仁义塞,废经而礼法乖,废经而孝悌廉耻亡,人且无异于禽兽。嗟乎!斯道之天下,其将渐灭矣乎!于是正其本者则曰:反经。挽其流者则曰:

① 《读焦里堂孟子正义》,《茹经堂文集》二编卷1。

② 《思辨录札记》,《唐文治文选》,191页。

③ 《南菁书院日记十六则·附录》,《唐文治文选》,第7页。

④ 《上沈子培先生书》,《唐文治文选》,第33页。

⑤ 《上沈子培先生书》,《唐文治文选》,第33页。

⑥ 《表论》,《茹经堂文集》三编卷2。

治经。<sup>①</sup>

儒家所谓修齐治平之道，在教人做人，教人在言听视动之际，以礼修身，勉为真君子，扩而广之，即可达到天下大治。曾国藩说“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正是此意。唐先生对此深以为然：

盖古之为教，所以范民志者，要在乎视听言动之间。<sup>②</sup>

经学之所贵兼为人师，礼学之所推是为理学。孔子说《易》曰“穷理尽性。”穷理者，人生莫大之学问，即莫大之事业也。<sup>③</sup>

凡士人通经学、理学而能达于政治者，谓之有用，谓之通人。不能达于政治者，谓之无用，谓之迂士。<sup>④</sup>

经学在宋、明时代发展成为理学。理学家以探究人的心性为主题，建立了完善的理论体系，对于规范与善化世道人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面对举世菲薄理学的现实社会，唐先生大声疾呼：

综览历史，理学盛则世道昌，理学衰则世道晦，毫发不爽。吾辈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标准。<sup>⑤</sup>

有明之季，其以文章理学鸣者，大都能以气节表褻于当世。社会得人之盛，非特远过宋元，抑且逾越东汉。是启运会之偶然与？抑一二贤人君子提倡之使然与？<sup>⑥</sup>

且夫理学之废兴，我朝盛衰之几也。……盖理学、经济相须相成，理学为体，经济为用。故理学兴则人心纯固，而国家于以隆盛。理学废，则人心机械恣睢，而国家因以微弱，此不易之理也。<sup>⑦</sup>

唐先生诸多宣扬理学之论文、演讲，直击世道人心，酣畅淋漓，意味深长，今人读来，或如清风扑面，或者振聋发聩，至今犹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盖今天下之大患，犹不在乎不谭洋务，而在乎人人嗜利，故吾辈欲挽回风气，振起人心，必当以理学为体，以洋务为用。人必先勉为君子而后可谈洋务，否则聚无品嗜利之徒，相率而习洋务，国家之受害，更无所底止矣。<sup>⑧</sup>

欲救斯弊，惟有去天下之利心，讲明性理之学，尚节气，崇廉耻，淬厉愧奋，则庶乎有自强之一日。<sup>⑨</sup>

唐先生指出，学界鄙视理学、视之为空谈心性，乃是腐儒的无用之论的说法，认为真正的理学家，同时也是关注时务的实学家，先生以陆桴亭先生为例：

桴亭先生之学，自天文、地理、礼乐、农桑，以及河渠、贡赋、战阵、刑法，无不源流毕贯，而一以理学为主，言乎其体，则躬行实践，履中蹈和，足以存天理于几希，拯人心于将死。<sup>⑩</sup>

在国家危机存亡之秋，尤其需要强调气节，舍此，国无以立，人亦无以立。唐先生喜好孟子，并非发思古之忧情，而是此书足以激励人的气节：

人生有骨，乃能立身天地之间。气节者，气骨也，无骨何以有节。然苟遇社会不良风俗，譬诸烘炉陶铸，不独易其心，并且销其骨，可惧孰甚！……孟子继孔子、子思之精神，故有泰山岩岩之气节，而先以辞受与取与为之标准。辞受与取与者，廉耻为之骨也。<sup>⑪</sup>

① 《施刻十三经序》，《唐文治文选》，第212页。

② 《学校论节录》，《茹经堂文集》三编卷2。

③ 《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文选》，第182页。

④ 《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文选》，第182页。

⑤ 《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文选》，第182页。

⑥ 《安雅堂文稿序》，《茹经堂文集》二编卷5。

⑦ 《上沈子培先生书》，《唐文治文选》，第33页。

⑧ 《读思辨录札记》，《唐文治文选》，第191页。

⑨ 《国文大义》，《唐文治文选》，第195页。

⑩ 《上沈子培先生书》，《唐文治文选》，第34页。

⑪ 《孟子气节题词》，《茹经堂文集》四编卷4。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唐先生极为推崇此语所言取与不取之道，正是独立之人格的体现。陆宝忠与先生在亦师亦友之间，陆氏累官至御史，严参权贵，直声甚著，氏有言“我虽不逮昔贤，而气节不肯稍贬。”<sup>①</sup>先生引以为同道。

唐先生看重人品、气节，1908年，唐先生接任南洋大学学监后，着手制定相关规范“各《学生规条》专以敦崇品行宗旨，务本而勿庸逐末，治表而益以近里。”<sup>②</sup>为砥砺学生品格，唐先生曾撰《人格》《弟子格》《学生格》《师友格》《社会格》《军人格》等，无不根基于理学，而指向气节。

## 余 论

本文至于此，内心感叹无似。我辈以“儒者”自居，而大多不知儒者所学何学，所为何为，乃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读唐先生书，深感惭愧。先生云：

吾辈既为儒者，自当具旋乾转坤之力，参天地，赞化育之功，方为无愧。<sup>③</sup>

今宜以至新之心理，发明至古之修德，且俾天下学者知圣贤之道，实在于行不在于言。<sup>④</sup>

《孟子·万章上》引伊尹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儒家所谓“以先觉觉后觉”之说当源于此。唐先生云：

故吾辈务宜独立不挠，力挽颓习，秉壁立万仞之概，不为风气所转移，乃能转移风气，有以觉世而救民。<sup>⑤</sup>

唐先生推崇宋学，实大有深意在。宋学之于学者身心之修为，气概之涵养，国性之确立，进而转移风气，觉世救民，均不可或缺。当今学者，无论治训诂、治考据，乃至治一切学问，都应该学习理学，此为唐先生留给今人最宝贵之思想遗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项目编号：14ZDB009）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初 阳）

① 《陆文慎公奏议序》，《茹经堂文集》二编卷5。

② 《咨陈重订章程和宗旨》，《唐文治文选》，第97页。

③ 《读思辨录札记》，《唐文治文选》，第191页。

④ 《学校培养人才论》，《唐文治文选》，第100页。

⑤ 《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文选》，第184页。

tional center of industry , commerce and finance , and the cosmopolitan culture as well as anxiety brought about by Shanghai as a place where China and the West encountered.

### **Study on Modern Shanghai Public Space and Urban Modernity from the Cafe** JIANG Wen – jun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spaces such as cafes in modern Shanghai indicated the emergence of “masses” centered on the middle class. As a new public leisure space , the cafes provided a sample? plate for the Shanghai middle class with a modern lifestyle and daily publicity. With such conveniences provided by the new public space , make people are clean the antiquate idea , more open to receive and accept new ideas , new concepts. Gradually , city life formed a kind of enlightenment and more acute , more informed public opinion. It furthere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public commonness of urban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 **Monsieur Tang Wenzhi’s Arguments about the Han – and Song – Style Scholarship** Peng Lin

The Qing Confucians were wild about the Han – Song dichotomy as regard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hip. They asserted that the Han – style scholarship was renowned for its exegetical explor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by contrast its counterpart in Song dynasties devoted itself to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most profound principles buried in the classics. The two types of scholarship wa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Qing scholars in the reigns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were self – styled inheritors of Han scholarship. They were highly proficient in the philologico – phonological studies , but meanwhile remaining hostile towards the Song scholarship. Tang Wenzhi lived in the twilight years of Qing. He named his study rujing , or Classics – Engorging Hall , revealing the truth that he liked very much the studies in Confucian classics. But on the other hand , Tang paid due attention to the Song scholarship , hoping that he could prepare a remedy for the declining public morals and scholarly work by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Song – style Learning of Way ( Principle) .

### **Examining Mistakes Committ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words of Four and Six in Pre – and Early Imperial Chinese Writings** ZHOU Yan

Due to differences existing in differing scripts , the two words – 四 ( four) and 六 ( six) – were easily confused in spelling in the periods of Qin – Han and Wei – Jin. For this reason , there very probably are mistakenly identified *four* or *six* in the modern editions of ancient books produced in the two periods , on the grounds that some parts of the books were written originally in archaic scripts prevalent in the Warring States era. The present author tries his best to point out and correct such mistakes confusing the readers.

### **Exploring Changes of Mohe People through the Prism of Fuyu – Bohai Bilateral Relationship**

SUN Hao

The Fuyu branch of Mohe people was recognized due to its activities in support of Tang’s administr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China. At that time , the Mohe people had already been divided into seven branches. Fuyu confronted the Bohai branch. But later , it was annexed by Bohai. Finally , Fuyu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rising Nuchen people. The vicissitudes of Fuyu and Bohai demonstrated that in three hundred years ( 7—10th centuries) changes of Mohe people were determined by the poli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ople and dynasti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central dynasties’ effort to politically recognize and categorize the Mohe people promoted the rise of Mohe’s ethnic consciousness. Responding to the imperial effort , Mohe acted positively and exhibited the most favorable ethnic attributes. In doing so , the Mohe people maximized the benefits. Generally and historically , Fuyu and Bohai unexceptionally developed an